
生态资本化进程中的公众参与

——基于江西抚州生态资本化的考察

李强¹²

摘要：好的生态资本化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路径。通过对抚州生态资本化进程的考察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生态资本化的关键在于建构良性生态价值发现与实现机制，为避免陷入资本逻辑则要求在资本化过程中积极引导公众参与，而实现有效的公众参与的途径在于发展共同体经济并充分发挥国家与政府的主导作用。

关键词：生态资本化；公众参与；江西抚州；生态文明

生态资本化是将生态环境作为具有投资、保存和更新价值的资本，进而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和谐统一的生态治理路径。好的生态资本化既可以实现生态资源存量的非减性，也能够最小化环境保护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当前经济发展境况下一种相对可取的生态危机应对方式。当然，如何形成好的生态资本化，或者说如何在生态资本化进程中跨越资本逻辑的负面作用，则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讲好中国生态故事的客观要求。

一、不同话语体系下的生态资本化

生态资本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对于生态资本化存在着迥然不同的话语解读，其根源则在于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不同认知。前者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可以实现良性结合，而后者则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生态资本主义是西方经济学界对经济发展造成的生态危机进行不断反思的结果。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中，自然环境为不变因素，而经济系统则是一个不依赖自然环境的孤立系统。比如著名的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 S. Kuznets）就认为经济增长不可能受到自然资源绝对缺乏所阻碍^①。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西方经济学家们开始对自己的经济研究范式进行了反思与修正，在经济学研究框架中融入了生态系统，经济系统被重新阐释为一个有限的存在于生态系统中的子系统。在此认知基础上，以生态资本主义为核心的学者们重新解读了资本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仅为技术层面的问题，从不质疑和挑战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政治，同时也不拒绝或不接受环境保护动机或生态道德意义上的

¹ **【作者简介】**李强，博士，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财经研究基地研究员，2008—2009 美国伯克利东亚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北京 100081）

²**编者按：**2018 年 4 月 26—29 日，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究小组在江西省抚州市进行学术调研。此次调研的主题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中的生态资本、绿色技术与大众参与”，是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究小组 2018—2020 年“作为一种转型政治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课题框架下系列调研的一部分，旨在推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深化与政策创议的实践。本刊特邀参加此次调研的中央财经大学李强、北京林业大学杨志华、福建师范大学蔡华杰三位专家解读调研活动，以飨读者。

³ ^①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常勋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年，第 121 页。

追问与批评^④，主张只要赋予自然生态环境以资本价值，并在市场中实现这些“生态资产”的价值，就可以通过技术更新克服或缓解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困局。至于具体的方法则可分为“市场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两类。前者认为市场是资本化的最有效途径，只要市场价格反映了生态成本，一直被外化的生态成本就会内化；后者则主张通过强制性的国家干预实现生态成本的内部化。

与生态资本主义不同，生态社会主义的支持者则认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是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的无限增值性与自然资源有限性存在着天生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虽然资本主义可能进行一些内部性的技术层面的调整，但也无法解决生态危机，在资本逻辑下，技术进步在提高自然资源利用效率的同时，也会使经济规模日益膨胀，形成更多的自然资源需求。资本主义的资本逻辑使得任何资本家对利润递减的第一反应就是成本的外部化，资本家也没有为生态危机负责的动机。这不仅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更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根源。因此，资本主义制度客观上必然要求不断地掠夺自然资源、加深环境的破坏程度，而解决这一矛盾的方式就在于改革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制度。

无论是生态资本主义抑或生态社会主义，其讨论的内核都是资本逻辑，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则需要跨越资本逻辑，这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笔者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一是生态服务的完全价值化，二是生态服务使用价值的回归。

二、生态资本与生态服务价值

目前诸多学者从不同领域对生态资本化的内涵进行了解读，笔者认为生态资本的内涵即特定生态环境系统能为人类社会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的总和。生态系统服务是一个服务束，存在着供给、调节、支持、文化等不同维度的服务。生态资本化的过程就是不同维度的生态服务功能的价值实现过程，其价值的大小则由生态系统服务的自身质量、稀缺性和开发利用程度所决定。三个影响因素之中以稀缺性最为重要，因为稀缺才会供不应求，才会产生交换价值，才会带来资本化需求。随着人类人口数量的增加与活动范围的拓展，生态环境已经从最初的“空”到现在的“满”，从资源供给到环境净化，每一种生态服务所对应的使用价值在现实生活中逐步显现出稀缺性。比如百年前人们可能不会意识到清洁空气的价值，而今天其无法替代的使用价值正由其稀缺性而变得日益珍贵。

采用合理的方法估算生态资源的资本化价值，既可以体现生态资源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也有利于缓解或遏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传统的生态服务价值实现机制局限于生态系统供给服务，而其他服务则缺乏价值实现机制。在今天生态服务使用价值全面稀缺的境况下，好的资本化要求对不同维度的生态服务均给予恰当合理赋值，这一方面应当以学者约翰·克鲁蒂拉（John Krutilla）所提出的全生态价值体系为基础，即 $EV=UV+NUV=(DUV+Iuv+OV)+(EV+BV)$ ^⑤，且只有将生态系统服务的各方面都价值化，才有可能实现真正好的、具有社会主义特征的生态资本化。

除生态系统服务全价值体系外，重新复活生态服务的使用价值，承认生态资源的内在价值，也是跨越资本逻辑的重要手段。马克思曾经论述到，在简单的商品经济中，货币只是用来促进具有明确使用价值的有区别的商品的中介，即 $C-M-C'$ 。交换开始于一个使用价值而终于另一个使用价值。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使用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附庸，生产关系变为 $M-C-M'$ ，用货币换取劳动和生产资料，再以此生产出新的商品，然后换取更多的货币。这里交换过程不会因为 M' 的获取而结束，而只是下一个 $M-C-M'$ 循环的开始，资本在寻求交换价值的循环中不断增殖，资本逻辑形成，造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环境退化的普遍规律。因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应复活生态资源的使用价值，改变以利润为目的的社会生产体系，转而以满足人类需求与享受

^④ ①郇庆治：《21 世纪以来的西方生态资本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 年第 2 期。

^⑤ ②克鲁蒂拉、费舍尔：《自然环境经济学——商品性和舒适性资源价值研究》，汤川龙、王增东、宁泽民、张文学译，马中、宁泽民校，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 年。

为目的而生产^⑥。此外乔尔·科威尔（Joel Kovel）则进一步提出了超越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在马克思的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体系中再增加第三种价值形式——一种尊重自然内在价值的价值形式。科威尔相信，通过引入内在价值可以推翻资本对世界的统治^⑦，笔者认为引入生态环境的内在价值则可以在生态资源资本化进程中实现跨越资本逻辑的目标。

三、抚州生态资本化进程中的公众参与

近年来江西省抚州市按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力争将自身的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尤其是在生态资源的资本化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总体来看，抚州生态资本化进程具有浓厚的生态现代化色彩，主要诉求依然是交换价值的实现，但有时也在过程中兼顾了生态正义和公众性环境参与的问题，可以说既有积极的经验，又有值得思考的方面。

（一）公民性参与

抚州生态资本化背景下的公民性参与主要体现在抚州市政府主导的“绿宝”方面。所谓绿宝，是抚州公众通过绿色生活、低碳生活赢取数字化碳币的 APP 机制。这一公民参与机制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公众参与，但通过比较绿宝与国内其他地区的碳币系统，我们发现抚州“绿宝”尚有发展完善之处，具体情况见表 1。

从表 1 我们可以看出：抚州绿宝依然存在着“运动式”碳普惠现象。目前，中国碳币吸引公众参与的主要手段是物质性的“胡萝卜”，即碳币可以兑换成一定数量和种类的商品。这种模式长期得以运行的基础在于充足的资金支撑。为解决这一问题，抚州希望构建“碳普惠联盟商家”，打通商家支付系统与碳币计扣系统，让市民可以利用碳币在餐饮、酒店、大型超市、5A 级旅游景区、绿色农副产品、书店等消费场所得一定优惠。目前这一工作尚在进行中，困难较大。分析国内深圳盐田与广州的碳普惠机制，可以发现这两者的资金支持均来自地方财政，这种资金支撑模式对于经济尚不属于发达地区的抚州而言确实存在较大的财政压力，实行起来较为困难。笔者认为，抚州如果将重点放在培养公民环境意识或提供公共服务便利方面入手，将物质性刺激转变为“精神胡萝卜”，可能更具有理论意义与现实的操作性。比如，抚州提出将碳币积累数量纳入“文明家庭”“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评选中，碳币可折算为相应分值，给评选加分即为这方面的探索，值得人们思考。

表 1 国内碳币情况比较表

	抚州	盐田	广州
注册方式	实名制	电话注册	网络注册
获取方式	600 步=1（个） 1 次公交=1（个） 1 次共享单车=1（个） 在线挂号	公交出行 步行	低碳出行 低碳生活

^⑥ ①约翰·B. 福斯特、布莱特·克拉克：《星球危机》，徐焕主编：《当代资本主义生态理论与绿色发展战略》，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年，第 39 页。

^⑦ ②乔尔·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一种人文现象》，徐焕主编：《当代资本主义生态理论与绿色发展战略》，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年，第 117—119 页。

	=5（个）	公共自行车	
奖励范畴	实物兑换（电影票）	在线兑换（充值卡）	在线兑换（充值卡）
	免费公交（次）	实物兑换（日用品）	实物兑换（日用品）
方便程度	低	高	高
主管单位	宣传部、文明办	区政府	发改委

来源：根据相关网站和 APP 整理

（二）经济性参与抚州地区生态资本化的经济性参与主要体现在农村地区，即农户将自己的生态资源转化成资本并取得经济效益的过程。这里以江西润邦农业开发集团的循环农业、临川龙鑫的生态养殖和乐安碳汇为例加以说明，具体情况见表 2。

从表 2 我们可以看出：抚州农村地区在生态资源资本化进程中在生态、经济和社会三个方面都取得了积极效果。相对而言，经济效益方面的效果更为明显，而公众参与也就是社会效益方面并不明显，尚待加强，这也是中国目前在生态资本化过程中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

（三）抚州生态资本化简析

通过如上分析，笔者总结出了抚州生态资本化的特征。一是政府的影响力在生态资本化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生态云平台，还是润邦、龙鑫等具有绿色生产特征的企业，其建立与发展都伴随着不同层级政府的支持，而且政府的支持是从政策到资金的全方位支持。二是外部资本是关键。在抚州生态资本化的公众经济性参与例子中，最初都是外部资本进入形成规模化经营，获取盈利后，再带动群众进行生态资产的资本化。河流、森林、矿藏等生态物品在未进入市场之前属于资源状态，而只有通过一定的赋值手段使生态资源转化成为能保值或增值的资产，才能成为生态资本，而生态资源的赋值需要规模化的资金支持。由于农民缺乏资金，又没有相应的融资渠道，因而只能依靠外部资本的进入方可实现。三是公民参与动机存在差异性，且以经济性参与为主。公民性参与动机在于环保意识，经济性参与则是获利冲动使然。前者属于长期机制且对资金要求较低，而后者有利于短期效应，并对经济发展水平有较高要求。

表 2 抚州经济性参与情况对比表

	江西润邦	临川龙鑫	乐安碳汇
转化途径	循环农业	生态养殖	碳汇市场
生态效益	农业污染、生物多样性、生态修复	尊重生态承载力，降低环境污染	预计 30 年内可固碳约 200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经济效益	年收入 2 亿元	年收入 6500 万元	30 年收入 1.56 亿元

社会效益	联系 农户 1000 多 人 次 ， 实现精准扶贫	提供就业岗位 390 个， 户均收入达到 6.5 万元， 帮扶农户脱贫 1100 多人	地方收入年数十万元
------	---------------------------	--	-----------

来源：根据抚州相关单位提供资料整理

四、反思与展望

通过对抚州生态资本化的考察，笔者作了如下思考：资本并不是造成环境危机的根源，资本只是一种手段、工具；生态资本化不可怕，可怕的是资本化的内容与形式。对此，笔者提出发展共同体经济与建设绿色国家两项建议。

（一）发展共同体经济

所谓共同体经济，是指将共同的社会道德考量置于利润追求之先、力图减少全球化资本的破坏性影响的各类经济实践。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是个体和人类集体长期小康生活的前提，而这只有在人类理解的共同体概念扩大到包括生态共同体和非人类他者时才能适当维持。照看自然不仅成为一种需要谨慎从事的工作，而其成为生态嵌入性自我的一种表达。从这一论断出发，在生态资本化进程中如果想要达到生态效益优先的目标，我们的发展模式必须转型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经济模式，而共同体经济就是一个可以尝试的选项，因为在共同体经济体制中，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再是我消费了什么，而是自己经济行为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果。重点包括对污染和资源消耗的关注，对其他物种和后代的影响^⑧。共同体经济本质上基于价值而非交换，在共同体经济中，交换一定发生在共同体背景之中，共同体经济中的市场交换关注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与生态价值的统一。也正是这一特征决定了共同体经济背景下，生态资本化过程更具有正当性，更具有社会主义特征。

从抚州的生态资本化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金融资本在生态资本化进程中的重要影响。比如抚州的润邦集团历时 7 年总投资 6.5 亿元，临川龙鑫先期投资 6000 万元，正是因为这些前期的大量资本投入，才解决了生态资本化过程中的前期积累问题。对于一般农户而言，由于缺乏资金，因而也就难以形成规模化的生态化生产。例如目前中国农村地区将生态资本转为富民资本，主要是以农家乐、渔家乐为主，这虽然具有一定的富民效果，但是普遍存在着规模小、档次低、二次污染等问题，无法形成规模性产业。共同体经济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公众资金少、较为分散的弱势，形成规模效应。在这一过程中，社区合作性的金融机构（社区银行）至关重要。总之，在生态资源转化成生态资本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而一般民众不具有这种资金池，这就容易导致一个区域的生态资本化进程蜕变成“生态圈地”，而通过社区互助金融体系，即可缓解甚至解决生态资源资本化进程中的资金不足问题。

（二）建设绿色国家

正如罗宾·艾克斯利（Robyn Eckersley）所指出的：“无论喜欢与否，那些关心生态破坏的人士都必须要与现存的制度作斗争，并不得不采取有序推进的战略。”^⑨不能否认，国家是一个成功地获取了在既定区域内对物质性力量合法使用的垄断地位的人类共同体。相对于其他政治力量，国家是最有潜力抵制资本霸权，促使社会沿着更加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方向重整社会经济体系的合法性力量。国家权力如果能够与环境目标与社会正义相结合，那么国家权力就可以理解为非压迫性的。从这一角度论述，国家具有强大的充当公共生态托管人的角色，国家比世界主义民主提供更多的社会连接性，又比传统的自由民主和公民共和主义更有利于考虑物种、跨边界和代际间的价值与利益。

⁸ ①罗伊·莫里森：《生态民主》，刘仁胜、张甲秀、李艳君译，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2016 年。

⁹ ②罗宾·艾克斯利：《绿色国家：重思民主与主权》，郇庆治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4—5 页。

当然，在新形势下，国家在生态问题上的功能与理念需要变革与转型。在应对环境危机的职能不再是传统性的被动回应的、补救性或惩罚性的，而应转向主动的、前瞻性的和预防性的角色。国家的主要功能不是直接介入到生态资本化的具体进程，而在于培育绿色公共领域和公民的环境权利。哈贝马斯曾经指出，民主社会中的政治体制如果想取得持续性的合法地位，则必须对公共领域保持敏感性。借用这一原则，笔者认为：生态资本化的进程中，政府应当对绿色公共领域保持敏感性，而敏感性的来源即为生态领域的公共协商，这也是政府在生态资本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与正确功能的前提。

此外，培育并保护公民的环境意识与权力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功能。由于竞争性的人类偏好的客观存在，国家无法保证每一个人的绿色生活诉求，因为并非每个人都赞成绿色价值或者对绿色价值有着同样的阐释，但是国家可以在培育公民的环境权力与责任意识，从而通过生态公民的权利意识对共同关切的环境问题进行民主协商来实施环境保护方面，发挥一种关键性的、更加积极的作用。

总而言之，如何在生态资源资本化的进程中跨越传统政治经济体系中的资本逻辑，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必须回应的问题，而现实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策略则是发展共同体经济与国家与政府决策的绿化。